

学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专家谈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论述“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时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出“着力提高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灵活性。

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是指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指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不尽相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精细研究和精准施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域性质和空间分异规律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也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早期把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为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并在理论上称其为“地理第一性”。起初,“地理第一性”可以对不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行解释,比如不少城市是在自然交通便利的地方或工业原材料所在地起源并发展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发展,人们发现“地理第一性”解释具有局限性。比如,有一些地方的经济集聚程度较高,却很少依赖其自然区位;也有一些处于大致相同自然区位的地方,经济发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樊 杰 李佳泓 郭 锐 陈 东

展水平却表现出差异;还有一些地方的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超过了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这启示我们,开展经济活动需要充分考虑地域性质,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也包括其他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如此。

具体来看,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及其组合都具有地域属性,存在着空间分异规律。第一,人类所要改造和利用的自然世界,其资源和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并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第二,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同地区的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差异也呈现出扩大态势。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既遵循传统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异规律,又会引发其地域属性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异特征。比如,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包括数据在内的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在这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支撑下,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并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程度与传统物质生产要素空间分异相比更高。又如,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者,是具有创造力、创新力的新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新型劳动者的空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并且与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地理空间的影响。比如,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为推动创新注入新动力。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少数较高层级的创新中心并通过集中攻坚实现突破;针对各类具体应用场景的创新,则是由下一层级的创新中心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场景需求进行落地开发。这推

动创新过程更多呈现网络化、层级化、跨区域特征。又如,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便利,人口和货物等的流动性也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大大增强。这些数据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等,共同形成了以“节点—网络”为特征的流动空间,节点之间的邻近性逐步取代传统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组织和配置的重要因素。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制度体系的构建,有力支撑了各类创新要素在创新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高效流动,加速创新要素组合和配置的优化过程,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总的来看,准确认识这些新特征新趋势,深入考察相关影响因素的地域属性以及空间分异规律,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构筑新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实践回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总的要求,但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能力会有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

总的来看,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包括: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强大的新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坚实的产业基础、充足的资金投入等。发达地区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较好基础,可以在研发前沿科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等方面先行一步,努力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不能简单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仅仅是发达地区的事。虽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如果放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脚步,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而借助发展新质生产力,则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开辟新领域新

赛道,进而实现换道超车。比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就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从本地实际出发找到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根据不同创新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涉及高水平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不同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比如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有的地区虽然科技创新资源相对缺乏,但产业创新能力强,有很多科技型企业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有的放矢,避免创新资源不合理流动。对于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重要的是加强颠覆性、原创性、前沿性科技创新,着力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需要充分发挥高科技人才的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于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地区,重要的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这需要集聚产业创新创业人才,打造高质量孵化器,畅通吸引新技术并实现转化的渠道,大力培育引领创新的科技型企业,发挥好各类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

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程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涉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要明确这三类产业的发展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找准发力点。传统产业更多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但不等于低端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升级,传统产业可以焕发新生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特点一是新、二是具有战略性,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围绕推动相关关键核心技术最新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产业创新发力,力争更好适应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未来产业会随着技术的成熟、扩散以及市场的认可,在未来某个时期成为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新产业。同时,未来产业的创新创意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判断等,存在失败的可能。这既要求鼓励支持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又要营造宽容的环境和氛围,在创新进程中不断调试纠错,让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具有科技视野的科技型企业家发挥作用。综合来看,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根据产业本身的特性因地制宜,依据地区要素特征,明确本地传统产业的优势与不足,选择适宜发展的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我们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改革进一步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有些干部还存在本位思想,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甚至弄虚作假、阳奉阴违。”这一针见血指明了政策执行中的重要问题。政策执行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事关国家治理效能、群众切身利益,必须杜绝“选择性适配”的心态和行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是一丝不苟、不折不扣的,同时,也有个别地方和部门在政策执行环节还不同程度存在“选择性适配”问题,盯着好办的“抢着干”,遇到难办的“绕着走”。有的党员干部执行政策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此类现象,本质上属于工作作风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政策执行中的“选择性适配”问题具有多重表现形式。比如,个别地方和部门执行上级政策专挑“细粮”吃,对好上手、易出政绩的政策“轰油门”式推进,对难啃的“硬骨头”、难接的“烫手山芋”则推来推去,搞击鼓传花;有的在政策执行中只拣“速食”吃,追求短、平、快,对短期内能出新出彩的事“情有独钟”,对需要长期深耕、久久为功的事则总打退堂鼓,缺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眼界胸怀。在政策执行中搞“选择性适配”,不仅损害政策的权威性,更有损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坚决纠治。

政策执行中的“选择性适配”问题,说到底还是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在作祟。个别地方部门和个人缺乏大局观、全局观,只顾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追求自身政绩打“小算盘”,在挑肥拣瘦中破坏了政

策执行的系统性,在推三阻四中影响了政策执行的联动性,让原本科学合理的政策在执行环节走了形、变了样,在推诿扯皮中变成“半拉子工程”。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都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是随意取舍的“选择题”,而是要压茬推进的“必答题”。在政策执行中,决不能以功利心态挑肥拣瘦,不能像市场交易那般算计“性价比”,必须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杜绝只想自己搞选择性落实、只顾表面搞象征性执行。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把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多从大局着眼,算大账、总账、长远账,主动对标对表、盘点归整,确保政策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如拼图般精准契合。

当然,强调政策的刚性执行,并不是搞“一刀切”“上下一概粗”,而是要坚持结合实际、分类施策。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既要靠政策执行中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力,强化责任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落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吃透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注重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实效性,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推动实现政策统一性和执行创造性的有机结合,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让政策红利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思想纵横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李丹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强化“中文+”交叉学科布局,形成国际中文教育复合型人才支撑

为适应知识融合与学科交叉的趋势,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战略、满足学习者提高职业胜任能力的需求,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促进语言教学与职业领域融合。尽管多数双一流高校国际中文专业已融入“中文+职业”课程模块,但将其作为独立专业方向的仍属少数。由于不同国家对“中文+”人才需求不同,“中文+”双师型人才存在结构性短缺。对此,需紧扣学科方向设置和教师队伍建设两大关键环节,推动“中文+”交叉学科布局走深走实。

靶向设置“中文+”学科方向。促进多单位协同发力,形成中外教育主

管部门主导规划、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实施教学、中资企业与行业协会提供实习平台、科研机构与科技企业开发教学工具的统筹机制。立足所在国国情,基于对其教育体系的了解和市场需求的分层调研,确定各国“中文+”专业的实际需求。比如,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中文+旅游管理”等项目,为亟须发展电商的国家和地区定制“中文+直播电商”等项目,实现人才培养精准化。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双师型教师能将企业真实工作场景转化为教学情境,有助于解决传统课堂“纸上谈兵”问题。但目前“中文+职业”双师型教师人才极为缺乏,应从提升增量和盘活存量两方面共同发力。比如,可让跨专业学生报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生、博士生,由学术导师与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对国际中文教师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对职业院校教师加强国际中文教学能力培训,形成国际中文教育复合型人才支撑;等等。

融入本土教育,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网络

国际中文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本土化。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建立语言教学与本地情境的深度关联,将有效提高教育成效、深化文化认同,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目前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来华学习,有8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表明国际中文教育“走出去”的空间广阔,应通过本土化来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

构建全学段本土中文教学体系。全学段本土中文教学需根据学习者不

同阶段认知特点,提供差异化的语言项目教学、文化内容传播和教育资源供给。为此,要切实推动中外院校进行中文教育合作,联合研发不同年龄段教学大纲、课程体系、本土教材,合作开展不同年龄段师资培养培训。比如,针对本土中文基础教学质量均衡化需求,可采用“校校结对”“师资共享”等模式提升区域教学水平;针对本土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可通过“双学位”“交换生”项目深化高校合作,实现中外学术资源深度整合;等等。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增强教育服务灵活性,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需求,探索不同形式合作,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走出去”发展为“长出来”。

推动“中文+职业”双重本土化。推动国际中文与职业教育双重本土化,能增强教育内容与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提高教育内容实用性和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感,是解决语言学习与职业需求脱节的关键创新举措。目前,我国已与全球30个国家合作共建了34个鲁班工坊等境外办学品牌,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合作国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可适时提升境外办学品牌的中文教学比例,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文化传播”走向“文明共生”。

加强数智赋能,打造国际中文教育智慧化生态圈

数智化是国际中文教育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充分运用数智技术,为学生提供真实生动的学习情境,打造协作、智慧、开放的学习环境,能够更好地提高课程情境感、参与感和体验感,提升教育效率与质量。当前,我国在

造发展动能、激发经济活力。

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因地制宜构建高水平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立以我为主、人尽其才的人才使用和服务保障体制。加快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增强基础 research 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度。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以产业发展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重塑产业链,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通过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聚焦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定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网络和体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分工、有序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积极引导各地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紧紧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布局需要,着力推动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新材料新技术等新型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等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使新质生产力全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跨方式一体融合发展。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大空间。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球创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与国际接轨,助力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转化为参与制定和引领国际规则、标准的优势,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围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科技资源均衡布局,不断优化相关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宏观调控作用,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口、面积等要素,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健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设置和布局,加大对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本文系全国政协“发展新质生产力学研究”课题成果)

利用数智技术赋能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开展了慕课、虚拟仿真、智慧课堂等诸多数智化实践。例如,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面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中国慕课建设数量和应用规模均居世界第一,等等。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发展还面临国际社会的数字鸿沟等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多元化的国际中文教育数智资源,推动国际中文数智教育优化升级和创新发展,提升学习体验。

开发国际化的国际中文数智资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别是不同地区学习者在数字素养和技能上的差异会导致国际中文数智资源的使用效果不同。因此,需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在中文教学各环节的实际运用,从线上线下帮助中文教师和学习者提升教学技能或更新所需数智知识等。此外,因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国家开展数智化教学的条件不同,还需持续优化数字资源建设和供给能力,开发更多适应各国区域化、差异化和分众化需求的国际中文教育工具。

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国际中文在线学习平台。多元化的国际中文在线学习平台能够帮助学习者建立广泛知识连接,实现学习资源动态更新,拓展学习活动的可能性边界。为此,应进一步优化国际中文智慧学习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打造多元化学习场景,提供更为精准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提供更多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方案,培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形态。

(作者为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研究员)